

博物館的苦澀與黑暗

黃宗偉¹

The Bitterness and Darkness of Museums

Tzon-Wei Huang

關鍵字：博物館、文化、民族認同、文化再現

Keywords: museum, culture, national identity, culture representation

¹ 本文作者為國立國父紀念館展覽企劃組助理研究員。
Assistant Curator, Exhibition Planning Division, National Dr. Sun Yat-sen Memorial Hall.
Email: twh1127@gmail.com

摘要

博物館從十九世紀開始蓬勃發展，直到二十世紀中仍是國家實力的展現機構，也是國家文化認同的源頭。博物館營運是否獲得認同，除了社會發展結果作為定位外，端看一個國家政策是否有較前瞻性的結果。近年來，臺灣博物館在類別上逐漸朝向多樣性發展，早期建立的博物館也因應社會變化的需求，而有內容上的改變，不論是典藏政策或展覽方向。然而，博物館在內容及表徵文化代表性上持續地有主題之爭，仍然是臺灣博物館因應時代轉型的困境，本文試圖從歷史發展論的角度，探討博物館形成的背景及角色，談論當今博物館經營仍面臨原初的文化議題，並論及臺灣文化與政治社會的影響，釐清博物館在新世紀與時代的轉變與應用。

Abstract

Since 19th century, the development of museums had flourished all over the world. Museums are considered the centre of the national and culture identity as well as the demonstration of power among nations. The indication of a successful museum requires not only the attentions from its society, but also to reflect national culture policy. In recent years, the trends of museum development in Taiwan also diversify in topics. The museums, established in the earlier time, have followed the policy to meet the need of society in collection policy and exhibition. However, some museums face the confliction between the identity they represented and the located society. It reflects the identity dilemma of Taiwan museums today. Culture and identity are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s in contemporary museums, and in Taiwan, the tension between those in museums becomes apparent and political.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complicity nature of museum identity,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dentity development and modern museum.

國家外在秩序及架構是神聖的；而文化完全是無政府狀態的敵人，因為文化教化我們對國家要有遠大希望及計畫。但如同相信理性及對人類努力達到完美境界的過程的信心，因理性的想法以及完美境界的元素及協助，我們漸有清楚的眼界，這些都逐漸充滿國家的架構，影響內部的組織直至法律與機構，正如我們所言，使得國家更是我們終極理性與完美的彰顯。

——馬修·阿諾德(Matthew Arnold)，1869，文化與無政府狀態²

一、前言

見證工業革命後社會劇烈變化的英國教育家馬修·阿諾德(Matthew Arnold)，認為國家能夠提供文化成長的基礎；透過文化，國家方能維持其穩定長遠的發展。阿諾德認為文化的本質是甜美和光(sweetness and light) (Arnold, 1869: 140)，其目的是人性完美的極至彰顯，沒有文化，國家只有陷入混亂的無政府狀態。文化透過國家的組織架構及外現的秩序被建構。這組織架構和秩序，是文化提供希望和良好設計所成。國家的架構及秩序，經法律和機構實值配合，以呈現更好的國家。阿諾德不但批判當時英國社會各階層，在既有的社會精神中，試圖提出理想思考，也是文化的精神。他雖認為貴族和中產階級可為社會帶來文化的基礎，但更鼓吹強而有力的國家可以提升文化的影響力(Arnold, 1869: 185)。如此，文化實踐唯有透過國家組織和其機構被完成，以各種手段帶領出文化精神。值得注意的是，博物館自十九世紀以來便是一個能強而有力地呈現國家與文化的社會機構。以國家為文化極至發展單位的阿諾德論說可理解，博物館不只是重要的教化機構，同時是一個涵蓋民族文化論述想像的場所。

文化與博物館是民族論述不可或缺的基礎。文化觀念與博物館的發展同樣地因著民族論述的需要而改變。當今文化議題被廣泛使用，以及博物館

² Arnold, Matthew, Ed., 1993. Culture and anarchy and other writings. p. 181.

全球性的流行其實是民族認同(national identity)的再確立。民族身分是策略性地透過文化系統建立，這系統是全面的，包括語言、歷史、民俗諛事和土地等(Thiesse, 2005: 122-143)³。而這身分的再確立，則是文化系統各項累積的過程。而博物館則為見證民族身分的建立與再現過程的最佳代表。然而民族思想的發展並非遵循一樣的歷史軌道，達到共為一體的極至。十九世紀以降民族身分卻一再經歷確立與分裂的循環，反映文化內容依然處在不穩定的位置，也使一直做為民族主義強化文化深度與民族認同的博物館，近來面臨新環境的挑戰。新史學⁴(1970-1980)、後殖民主義、文化研究與新博物館學(1989)等的發展，在博物館的收藏政策、展示方式、文物詮釋、物質文化史觀、社會教育功能、經營管理、社區參與、甚至館舍位置以及政治地位進行全面性的批判。面臨種種挑戰進而因應及改革，是苦痛的過程。矛盾的是，當博物館佔據文化詮釋的位置及文化聚焦的功能，往往博物館內部的決策過程是不夠透明的，如莎朗·麥唐諾(Sharon MacDonald)所言不但決策是由多位「作者」進行書寫(MacDonald, 2002: 94)，同時，是權力妥協結果，這是晦暗不明之處。本文將就博物館面臨苦痛與黑暗，反應以國家定位文化的難處。

二、「國家化」文化的發展

現代國家皆致力於文化政策制定與國家文化建構，甚至制定所謂文化基本法，期待文化發展的正常化。多明克斯(Anna-Marie Dominguez)稱這現象為文化主義(culturalism) (Dominguez, 2000: 21)。文化主義呈現文化就是生活，我們根據文化來思想與行動，進而在社會與政治上策略性地召喚(invoking)文化。一方面，當代文化競爭使多數國家政府思考並提出適切的文化政策，另一方面透過這些政策或策略建構國家文化。衝突的是，文化主義的流行不

³ Thiesse, Anne-Marie, Ed., 2005. National Identities. Revisiting Nationalism, pp. 122-143.

⁴ 「新史學 *La nouvelle histoire*」來自法國中世紀學者 Jacques Le Goff 所集成的專輯書名，他同時也蒐羅許多研究並集結成了三大冊專輯，有關於新命題、新方法以及新物件。

如理想地完整呈現當代文化的多元性以及平等地顧及各樣文化的發展。重要的是，國家機構主要是博物館經常成為文化競爭的戰場，希求透過國家機制以穩固文化成長。文化國家化的過程往往適得其反使文化政治化。以國家化文化為標題意指，國家不論是想像概念或是機關構成體，都無法確實涵蓋文化所涵蓋範圍。也就是說國家文化不等同國家在地理面向內的文化整體。如此，所謂「國家文化」的過程在民族(nation)與民族主義(nationalism)起源中如何被形塑，將影響國家文化具體化(substantiation)的過程。

(一) 民族、民族主義與文化的關係

現代民族、民族主義與文化的發展可說是密不可分的，進一步，博物館的發展也成為民族主義發展的必然結果。然而文化的形塑在民族建立和民族主義發展的中扮演的角色，反應當今文化主義的本質上的狀態。當代學者著重於理論化民族主義，和現代國家建構論經常相互混淆。Christophe Jaffrelot認為「民族含有國家機構面向的，也就是民族國家。而民族主義是一種控制民族的意識形態，在不同民族中促進認同的確立。」簡言之，民族主義根基於認同政治學⁵。(Jaffrelot, 2005: 11)班那笛克·安德森說明現代民族形成普遍歸就文化因素(Anderson, 1991; Gellner, 2006: 52)。民族主義形成是現代民族的產物(Jaffrelot, 2005: 12)。現代民族形成與文化均質性有關，安德森歸納語言，歷史與宗教三項均質性是民族形成的成分，也是民族主義興起發展的依據。他提出民族是被想像出來的概念，以解釋均質文化對民族與民族主義的形成之影響。他的觀點民族是想像的政治社群是內在受限以及主權的想像⁶。想像依據了三個文化根源，宗教社群、君主制度以及對時間的想像

⁵ 'Nations have an institutional dimension that is state-oriented-hence the notion of 'nation-state'-, whereas nationalism is an ideology (an 'ism') which often claims the control of a nation and/or promotes one's own identity against Others'. Its foundations, therefore, are rooted in identity politics.'

⁶ 'It is an imagined political community-and imagined as both inherently limited and sovereign.'

(Anderson, 1995: 9-36)。安東尼·史密斯也認為想像觀念(the concept of imagery)幫助我們瞭解民族主義(Smith, 2004: 82)。另外根據恩尼斯·蓋爾納(Ernest Gellner)則指出文化均質化的過程就是民族主義的本質。也就是工業化社會影響之下所造成的現象。

(二) 民族「想像」的文化背景

安德森指出民族是想像的產物。因為「就算是最小的國家，每個國民永遠無法認識所有國民。想像範圍也是受限於其人口與疆界，再大的國家也不等同於所有人類。」另外重要的是國家主權的想像，啟蒙時期後，主權不再是神所賦於且階級化的，取而代之的觀念是主權來自於個人。(Anderson, 1995: 6)國家便在個體的存在認定與這樣個體集合下自由的形成，也就是主權國家的形成。換句話說，民族的形成過程是經由想像的，在個體不斷地思考，自身與其他個體的關係；不斷地進行觀察、比較、分析與想像，對自身的情境與其他個體或民族體，區別出同質與差異，以辨別出彼此的認同。

安德森深就民族想像的來源，他認為宗教社群、君主世代及對於時間的理解是民族想像的根據。兩個民族思想成形的文化組織：宗教社群和王朝世代不但是古典時代最重要的組織⁷，也是現代民族的前身。不論那個文明，宗教社群自古俱有重要地位，也與生活息息相關。其中維持宗教社會地位的一項主因是其對其神聖經文的保存、詮釋與傳揚。如在古典歐洲，聖經書寫語言是拉丁文，使之為神聖且唯一接近真理的語言。宗教團體是透過書寫語言來想像組織。第二個社群是王朝世代。世俗王朝因著天賦神權擁有組織人民的政治主權，城邦政治依循王權為思想中心，安德森觀察此時邊界概念的影像是模糊的，做為被統治人民也反應出認同的鬆散以及不確定。和宗教社群相似的是，舊王朝做為神在地上的代理人，擁有處理一切事務的主權，進而形成一種向心性的政權組織。

⁷ Anderson, B., 1983. *Imagined Communities*, p. 12

另外安德森提出民族成立要素有三方面，宗教、政治以及同質時間的想像。古典歐洲因著印刷術的發達，小說與報紙迅速的發展，人們可同時與不同地的其他人想像相同的時間，即安德森所謂「同質且虛空的時間」。也就是說，小說及報紙的時間是想像時間。這想像的時間是同質且虛空的時間。尤其是小說，讀者可進入作者所設定有限的時間內，想像小說情節，同時小說內的時間能夠完全理解及掌控。報紙可說是小說的另一形式，報紙時間限於一日或半日，內容是編輯各地新聞事件。也就是說，報紙報導和發行受限於使用相同語言的地區。這現象安德森稱為「共時性」(simultaneity)提供讀者同質時間的想像。事實上，安德森點出民族(nation)與國家(state)的差別在於民族有共同文化經驗分享的意涵，而國家是法理上建立的組織。最後，民族之所以形成，安德森認為因著舊有宗教及王國的沒落，加上新世代共同經驗的產生，民族逐漸取而代之，成為新的想像中心⁸。

新世代的共同經驗，一般認為現代化過程(modernity)是最主要原因。根據恩尼斯·蓋爾納的說法，現代化所指農業社會過渡到工業社會的過程。生產科技的革新是工業化過程的重心，並衝擊文化發展。現代教育因應工業化的兩項需求而發展。一是機動且分工的勞動力；另一項是溝通標準化的需求，也就是於不同人之間持續、經常以及精確的溝通，意謂個體間能使用統一的字彙和書寫方式與分享明確的意義⁹，這些需求是農業社會無法提供，也非小型資本團體所能生產的。換句話說，工業化所需的專業人力只有透過現代教育的訓練方能有成。意味著唯有透過國家組織進行現代教育的建設(Gellner, 2006: 33-36)，以滿足工業化社會的需要。其中蓋爾納提到現代教育使識字率提高，同時標準化語言與溝通方式。語言事實上是文化傳播最重要的因素，現代教育的發展意味語言（尤指識字率）的普及，工業化的需要使現代教育革新標準化語言的使用。這過程加速了現代均質個體，更重要的是

⁸ 探險世界與神聖語言失去原有地位，造成宗教對社會的獨斷性消失，使得社群神聖地位為民族所取代。

⁹ 'sustained, frequent and precise communication between strangers involving a sharing of explicit meaning, transmitted in a standard idiom and in writing when required.'

語言不只是知識傳播的工具，也是生活經驗與價值分享的媒介。這延續安德森的文化語言論述，古代獨佔語言失去其神聖獨斷的地位，世俗語言取代其地位的真空。工業化前的印刷資本主義以及工業化過程，書寫語言的普及，同時廣播知識與觀念。按照安德森的說法，使得分享共同經驗、想像共同命運成為可能。

由安德森或蓋爾納的理論得知，民族的形成本自文化均質性開始，尤其是語言扮演的角色。現代化及工業化的過程，所需基礎就是語言普遍化以及資訊交流。安德森以為印刷資本主義是工業革命前協助文化均質想像的基礎，而蓋爾納則是著重說明現代教育對再強化文化均質過程的重要影響。他更……認為「(工業社會的選項)其中一項就是民族主義者所需某種文化均質性……並非是……民族主義促成均質性；而是客觀且無可避免的必然性促成均質性最後出現在民族主義形式的表面。」¹⁰ (Gellner, 2006: 38)

更一步理解，「文化的均質化產生了一種新的、民族的意識，這意識就是蓋爾納所說的民族主義」¹¹(Jaffrelot, 2005: 19)，而他所說的民族主義即產生集體歸屬的意識，這意識最終發明了民族國家(nation-state)。民族主義著往往為強化這歸屬感，不斷試圖在過去找尋民族的傳統以為根據，另一方面，甚至是「發明傳統」來補足完整認同的根據。

(三) 民族認同

蓋爾納認為民族建立和民族主義產生是工業社會發展必然的結果。現代化教育在扮演民族意識的推動重要地位。對於民族主義者而言，成立國家是

¹⁰ The kind of cultural homogeneity demanded by nationalism is one of them (options of industrial society)...It is not the case, ..., that nationalism imposes homogeneity; it is rather that a homogeneity imposed by objective, inescapable imperative eventually appears on the surface in the form of nationalism.

¹¹ Cultural homogenization thus generates a new, national consciousness that Gellner calls 'nationalism'

理想與目標，建國夢想的必要性，不論是意識形態的或工業化社會必然結果，民族認同成為不可或缺的心理過程。事實上，民族認同是理性與情感的產物。正如前面所提民族認同是民族主義者呈現均質文化的實質表現。蒂斯(Anne-Marie Thiesse)認為表列民族認同「事實上形構民族信仰」¹²。其提供郵政系統以及金融貨幣上圖像的應用基礎。歐洲民族發展的初期，民族認同表列不斷透過國家內部的檢視，也成為國與國之間比較是否俱形成「國家」的基礎。蒂斯列出八項基本的表列要件：為民族考古學服務的民族誌、民族語言的形構、民族的歷史誌、歷史紀念物、民族民俗佚事、自然的民族化、先祖流傳的民族疆界以及一個根據擬古主義的現代性¹³。這表列項目在文化不同層次中運作，也在民族形成初期社會階級中造成影響。蒂斯的觀察說明民族主義發展以文化做為民族認同基礎，民族主義者進而找尋合適的「文化內容」進行改造和均質文化建構。事實上民族認同已經是蓋爾納所言透過現代教育積極在限有範圍中思考空間和時間，使界定民族成為可能之事。而重要的是需藉現代教育為媒介與共通語言快速且有效地進行傳播。蒂斯認為，民族認同是一套差異的分別的程序¹⁴。這程序在歐洲大陸十八世紀中期漸漸成為主要政治文化運動，在即有各君王朝政權建構民族。

事實上文化在民族認同上扮演基本且影響深遠的角色。文化是民族思想產生的背景，也是民族認同的根據。事實上，民族認同列表說明出民族主義者希求透過條列的過程，科學地且細緻地為民族與民族主義建構一個均質文化的現象，同時凸顯與其他民族的差異。然透過民族主義者對文化的觀察、整理以及想像得出的文化結論，在國家機構的運作下成為一民族文化整體的代表。也就是說，民族主義者所以認定的民族認同往往就是文化認同。然歷史的演變證明民族文化認同一體兩面論事實上是一種意識形態操作。

¹² The identity checklist in fact constitutes the matrix of a nation's set of beliefs. p. 124.

¹³ Ethnography in the service of the nation's archaeology,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languages, national historiography, historical monuments, national folklore, the nationalisation of nature, national territory as ancestral property, a modernity based on archaism.

¹⁴ Thiesse, A., 2005. National Identities – A Transnational Paradigm, p. 123.

三、策略化運用博物館

民族主義不只在十九世紀的歐洲發酵，同時被傳播到歐洲之外的殖民地。此時文化在歐洲以國家化型態呈現，在「民族」的架構下擺置，文化被調整而有利民族發展，更重要的，民族化文化成為一種主流的思想架構，能夠被「標準化」的處理。文化標準化成為各國相互競爭的基礎，也被挪用成為統治殖民地的策略。隨著歐洲的殖民擴張，博物館也幾乎由殖民者以標準化型式帶進殖民地。結合人口普查及地圖局，殖民地博物館也成為殖民者統治的三大政治機構，重要的是和殖民母國的博物館不同，殖民地博物館並不只是文明發展和公眾教育的場所，更進一步的是文化統治策略及手段和殖民成果的炫耀。根據安德森，殖民地博物館的建立，是經過一套政治、軍事、經濟和文化教育的細緻運作，不但是殖民政府對殖民地更加了解，更重要合理化殖民政府在殖民地文化歷史定位，以及為其建立政治上統治的正統性。

（一）博物館成為國家文化再現的平臺

回溯當時西方博物館的建構，博物館（公共博物館）在西方社會被形塑成三個角色，是社會菁英的藝術寺廟，同時也是公利主義者民主教化以及訓化社群的策略性工具¹⁵。然而，當時興起的民族主義，同時地被運用在博物館當中，成為公利主義隱藏的教化內容。雖然公共博物館不是民族主義運動推動的主要機構，但其透過建構和目的，教化的空間以及展示的複雜體，使其民族思想的建構內化於人民的思想。

前面提到民族國家策略性的運用博物館做為統治工具，相對地，博物館本質上是具有特殊異質性，使得所運作的空間具有通用價值。米歇爾·傅柯

¹⁵ Yet, and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Hooper-Greenhill argues, (Hooper-Greenhill, 1989) the public museum was shaped into as an apparatus with two deeply contradictory functions: 'that of the elite temple of the arts and that of a utilitarian instrument for democratic education' (Hooper-Greenhill, 1989: 63). To which, she contends, there was later added a third function as the museum was shaped into an instrument of the disciplinary society.

(Michel Foucault)提到博物館存在異質性空間的機構，異質空間(heterotopia)其實是相對映於理想空間(Utopia)，是經過想像具目的導向的空間。他進一步解釋：他所提異質空間存在社會真實空間中與理想空間的真實對映，透過對映重新檢視異質空間中來重整空間內容。博物館、文化與國家的關係不論是十九世紀或是存在當今社會，唯有透過博物館的異質性機制，使得國家與文化能夠具體被再現。

(二) 博物館的歷史角色與轉向

民族主義論述(nationalism)形成時，首要是面臨民族身分及民族文化的確立。民族身分建立則主要的在於差異，文化可說是差異的資料庫(repository)。雖阿諾德主張文化是完美的自我實踐，他同時暗示實踐文化的先決形式和活動存在當時貴族和中產階級。也就是說透過社會文化差異的比較而找出文化應有形式。重要的是，其強調國家的法律與機構對文化發展的絕對地位。對文化差異的釐清與建立，十九世紀的博物館已具備這樣的角色。雖然博物館不是當時形塑文化差異的唯一機構，其卻是文化差異累積重要機構。當今博物館發展多面向性，在類別上複合時間、區域、文化主題的多元性，能夠說明博物館在文化發展的重要角色，以及文化再現具有有力的地位，源自於博物館早期發展時所賦予的權力機制及潛在提供差異性的特質。

四、文化轉向

在蓋爾納的民族與民族主義中提到，文化是民族形成根本因素。他以自然與花園的植物作為解釋文化在農業與工業社會的狀態。農業社會的文化是多樣的同時自發性的繁殖(reproduction)，正如野生的植物一樣，「自然繁衍

且無意識擺設、觀察、監控或特別養分施肥。」¹⁶而工業社會的文化發展則像是花園裡的植物一樣，「儘管他們（文化）原本是野生。他們的複雜及豐富特質多數依靠專業知識廣博的園丁來維持。如果缺乏在特殊機構中那些全職專業的園丁盡心地特別的照料的話，他們便會遭遇生存困境。」¹⁷也就是說，蓋爾納認為不同於處在農業社會中，文化和其他事務一樣，在工業化社會中，根本地在產生過程到繁增面對新的結構性的改變。使得原來可以自然產生的文化，演變到人為可以操作的文化。這進一步說明人類社會工業化後，文化發展所面對不只是演續存在的問題，更是如何被選擇發展的問題。換句話說，決定文化發展唯有按著阿諾德的思想，透過理性建立的國家機制，其所建立管轄的機構，就像訓練有素的園丁一樣，可以讓文化發展更獨特、更細緻，同時回過頭影響國家及其制度、組織、機構發展得更完備。他進一步點出，所謂農業社會的精英文化或偉大傳統的存在，是由於其佔據權威的地位，或是由權力者所承襲的。而這些文化及傳統面對工業社會的轉變，雖失去其權威的地位，但其發展出的語言及傳播的習慣和風格，往往被大量採用。

有關前面以農業社會來比喻文化呈現狀態，民族主義具有目的性的選擇所需論述框架的文化內容時，同時也提供另一個方向思考文化的管道。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點出文化有兩個面向，一個是已知的意義，另一個是方向(2003: 17)。也就是說文化是生活內容的全部，也具有不同面向的普遍性以及多樣性，這樣的多樣性隨著時間的延伸，文化的發展，終就不只是民族主義所談的具國家代表性的文化，而是其他人類生活，因地域、氣候、環境、人種、膚色、性別、階級、年齡所表現出的內容，是當今文化發展的現狀。

¹⁶ reproduce themselves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without conscious design, supervision, surveillance or special nutrition.

¹⁷ Though they have developed from the wild varieties. They possess a complexity and richness, most usually sustained by literacy and by specialized personnel, and would perish if deprived of their distinctive nourishment in the form of specialized institutions of learning with reasonably numerous, full-time and dedicated personnel.

霍米·巴巴(Homi Bhabha)所提找尋文化地點是當代的客題，「現今界線後的轉變，在時空交錯產生的異與同、過去與現在、內與外、包涵與排除的複雜情境中。對文化場域已不在根源(originary)和傳統(tradition)中找尋，而在多樣基本文化分類的『間隙』中定位場域。也就是說，定義文化，不再只限定於階級與性別，而更是在幾個新的區位中，種族、性別、世代、機構地點、地理政治的區點，性向中重新找尋新的認同身份。不論是理論或政治上，文化差異的討論是更為細微。」也就是說，在個各社會關係交疊的間隙中，透過不斷的協調，文化存在這樣的情境中形成，尤其在國家性，社群興趣以及文化價值中。巴巴更進一步提到，當代文化的光景在於文化的差異，差異成為文化討論的本質，透過差異的再現，不斷的衝突與整合。就少數者而言，「差異在社會突顯下是一個複雜且持續的協調，這協調是為了在歷史轉變中文化雜合的正統化。」¹⁸

五、結論

十九世紀起對於文化的討論，已持續一百多年，從混沌到高低、現代到後現代、西方到東方、本質到實用，文化一詞源從人類最原初農業活動開始，到個體或群體界定身分的依據，擴大到民族並以民族主義來思索文化的本質，文化始終呈現超越定義的豐富，本文試圖從當今論述「文化」的大海中，追尋做為文化容器與載具的博物館機構，如何由民族國家的設計理念借重，提出了需求，並提供博物館形構的設計圖，發展出獨有擷取文化的器具，以及再現的櫥窗。

實際上文化形塑了博物館，但並沒有限制博物館應呈現文化的方式與方向。博物館空間的異質性，提供文化及知識建構過程的具體呈現。然而這樣

¹⁸ Bhabha, H. K., 1994. The social articulation of difference is a complex, on-going negotiation that seeks to authorize cultural hybridities that emerge in moments of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p. 3. London: Routledge.

的呈現過程中，是透過被賦予的權力，使能運作，相對地權力同時具有論述的方向性與結構性，使得詮釋文化多半受到權力的影響多於呈現文化的原貌。如此異質性空間的表現，不但提供公利主義者一個特殊教化的利器，另一方面，相同提供權力運作的主要平台。雖然博物館不斷隨著時代被挑戰和改變，但卻不因透過不斷地更新其展示手法技巧，或是新科技的運用與包裝而使其失去為民族主義建構之隱藏強大的影響。反之，權力意識往往是博物館文化再現的中心以及是國家文化建構的重點。因此不論是國家文化和國家化文化，博物館是否必須跳離國家的框架，文化可否得以透過此機構被定義、包涵、具體形構、代表、再現、複製、保存或流傳，最後找到真正的意義與價值。

參考文獻

- 劉建基譯, Raymond Williams 著, 2003。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彙, 頁: 17。臺北: 巨流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 Anderson, B., 1995.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Verso, p. 12.
- Bhabha, H. K., 1994.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p. 3.
- Collini, S. (Ed.), 1993. *Arnold: Culture and Anarchy and Other Writings (Cambridge Texts in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181.
- Gellner, E., 2006.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past (2nd ed.)*. Blackwell Publishing, pp. 38.
- Hooper-Greenhill, E., 1989. *Museums and the Shaping of Knowledge*, p. 63. London: Routledge.
- MacDonald, S., 2000. *Behind the Scenes at the Science Museum*. Oxford: Berg Publishers.
- Smith, A. D., 2004. *The Antiquity of Nations*, Blackwell Publishing
- Thiesse, A. M., 2005. *National Identities: A Transnational Paradigm*. In: Ed., Dieckhoff, A. & Jaffrelot, C., (Eds.), 2005. *Revisiting Nationalism*, p. 122-143.